

## 父慈的艰辛与动人：论曾国藩的《教子书》

王志宏

曾国藩的《教子书》是中国古代家训、家书的集大成者，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家训所有最核心的内容，也最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教子的根本特色。在本文中，我们不仅仅是叙述曾国藩《教子书》的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寻绎出曾国藩教子思想和儒家思想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曾国藩教育子女不仅有法度可寻，而且这法度和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

依愚之见，曾国藩《教子书》的主要内容可以从5个方面来探讨，第一是教子的目标，第二是教子的内容，第三是教子的原则，第四是教子的基本途径，第五是达到教子目的的基本保障。

曾国藩《教子书》，虽说只是一戈戈小册，其中绝大部分是曾国藩戎马倥偬、时时准备着马革裹尸的时候写下的：他白天要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到了晚上，他除了自己要读书、写字之外，还要给他的儿子（包括给他的侄子）写信，对他们进行教育，传道授业解惑，把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告诉他们。在那样一个忙碌紧张甚至心怀恐惧的时刻，作为中兴第一名臣，他从来没有放弃或中断过对于子侄的教育以及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写家书，这本身就是很耐人寻味的。

对于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教育目标。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曾国藩想要把他的子侄（请注意是子侄，而不仅仅是儿子，也不是子女，这与中国传统文明的家族本位有着本质关联）教育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自己做大官，带兵打战，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似乎他应该让他的子侄承父业，或做大官，或为大将。但是，他教育子侄的目标是学做圣贤，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非从事某个特定职业的人。曾国藩深深理解孔子所说君子不器的真义。重要的是首先把他们教育成一个真正

的人。他并不坚持子侄一定要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不期望他们成名。他在一封信中说：“凡人皆望子女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貽万世口实。”一方面，一个伟大的民族和时代一定是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回避战争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的问题。在儒家系统内部，针对管仲，一方面，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久矣”，但另一方面，孔门“无道齐桓晋文之事者”。曾国藩语重心长地说，“尔曹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

曾国藩认为，子女一定要放在社会上教，因为他是处于某个特定境遇的人，他不可能脱离他已经被抛入的世界和时代。如果以那种脱离他们的世界的方式去教育他的话，那就会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他要么是神，要么是兽。在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他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无尽。第宜束身圭璧，法王羲之、陶渊明之襟韵潇洒则可，法嵇、阮之放荡名教则不可”。尽管曾国藩不要求子侄必须参加科举考试，或者他们也可能考不上，但是他们必须读书，写字，培养自己的性情，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谈到性情，曾国藩认为，“世家子弟，最容易犯一奢、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皆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此处吃紧。《论语》载孔夫子说，“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曾国藩认为，做人更多的是要在人之本性方面对自己以及他人有所要求，而不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位高权重，车为宝马，或者说房子一定要是别墅。南京叛乱已平后，他们一家人很想迁家回湖南长沙。曾国藩不答应，他说长沙那个地方很糟糕，世家子弟都喜欢相互攀比，如果他家迁过去的话，他的子女势必会染上这个地方的坏习惯，所以在他看来还不如多在南京住两年。他考虑问题首先总是涉及下一辈的教育与德性问题。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官贵气习，则难忘有成。”有钱有势者总难免骄人，有些官宦人家喜欢在家门口贴“某某府”的字样。曾国藩是真有资格骄人的人，但是他却反复叮咛自己子弟，“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

曾国藩教子的目标是要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对子女的要求，不

仅仅在心，也在身。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读书明理，做一个君子之外，他还特别在养生方面要求子女，要让子女身体特别健壮。心、身本一而无二。曾国藩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是不要一有病就吃药。“药虽有利，害亦随之”，是药三分毒。中国人调养身体的基本方式是打太极拳、调息、静养和慢走。他还专门讲“清静调养，不宜妄施攻治”，不能随使用很猛的药来治病。在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九号，他在给他的儿子的信中写道，“吾近夜饭不用荤菜”，他说每次吃晚饭的时候，他不吃荤菜。“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令极烂如泥，味美无比，必可以资培养……试炖与尔母食之……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他认为这样能够做到一举两得，一方面是勤俭，一方面是养生。

曾国藩教子的目标最典型的体现在他的遗嘱上，他的遗嘱的底色有点像他的《讨粤贼檄文》。他说：“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群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勩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并令二子各自勩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哪四条呢？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静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全部都只是关乎如何做人的问题，是《教子书》的基本内容。家教主要是德性教育，在这部分我们主要是讨论曾国藩的家教或德性教育的主要内容：德目。严格地说，《教子书》最主体的内容体现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巨细靡无遗地讨论曾国藩德性教育所包含的德目问题，而是要指出他的家庭教育所选择的德目的特殊性。正是在曾国藩特别看重的那些德目中，我们既能够体会到他的德性教育的普遍性，也能够看到他如何因材施教，有的放矢。这也是父子之间的亲熟关系才能做到的。西方师生关系的最高境界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中国师生关系的最高境界是“情同父子，视如己出”，这绝不是偶然的。

曾国藩家庭德性教育的德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曾国藩个人特定的要求；第二点是曾国藩家族的祖训，曾家世代代遵守的品格上的要求，或者德性上的要求；第三类是公共的品格，在儒家生活形式当中，只要是人，或者说是一个好人就应该遵守的德性要求。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分类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突出曾国藩《教子书》的真精神，并通过这一点凸显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特征，而非一个绝对的区分，事实上，这三类德目之间相互包含，相互牵连。

第一个是早起，第二个是重。起早这件大家眼中不值一提、只不过关涉个人习惯的小事，在曾国藩看来，从小的地方说，关系着一个人的德性，从大的地方说，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因此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

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

这件事很重要，含糊不得。他在另一封信中也说，“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曾国藩家书中不停地谈早起这个问题，至少有五六封之多。

第二个是重。《论语》当中很多次讲重，“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为什么曾国藩会和孔子一样特别强调重？重是什么意思？重表示人生的凝重，这是儒家对于生活的一种理解。只有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生命中某些重要的东西，我们才能承受得起历史使命给予我们的重担。君子之重来自于他所要承担的使命，《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据粗略的统计，曾国藩《教子书》提重至少有15次之多。他有一封信说，“我于尔有不放心者二事，一则举止不甚厚重，二则文气不甚圆适。以后举止留心一个‘重’字，作文要留心一‘圆’字”。（咸丰十年四月初四）又一封信说，“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气高坚，则可变柔为刚；轻则易刻，唯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又说，“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言语迟钝，举止持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同治元年四月初四）又说，“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屡次三番，不厌其烦，父慈之情，于斯最盛！

接下来谈家传的品格。曾家有一本世代相传的家训，讲求“书（读书）、蔬（种蔬菜）、鱼、猪”四个字。曾家家规中有治家八法，其中包括起早、打扫洁净、诚修祭祀、善待亲族邻里等等，曾国藩要他的子侄继承。他尤其重视诚修祭祀：“凡器具第一等好者留做祭祀之用”，“凡是饮食第一等好者亦留备祭祀之用”。中国古代的祭祀，包含与先祖同时也与神明之间建立起一种交往的含义。通过祭祀，一个家族或共同体人丁兴旺，民德归厚。他说：“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第三类德目关乎公共的品格。公共的品格主要是勤俭，戒骄奢，家里不要积货财等等。虽然不容易从这些德目中理解曾国藩家教的特殊意义，却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

基本特征。这些德目亦是被现代性驱逐得最厉害的一部分。

第三，是教子的基本原则：自我反省，以己为鉴，以身作则。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时，常常是从自己出发。他总是跟他的儿子说，某件事情他之希望他们去做，并且做好，是因为多年前他自己曾经做过但没有做好，他要子侄辈为父争气；或者，他曾经做某事，做到某种程度，积累了很多经验，他把他的经验告诉，以期他们继续往前走。曾国藩教子的基本原则并不是一味高高在上讲大道理，好像是圣人宣教，耶稣登山训道一样。恰恰相反，他首先建立起父子之间的一种关联，然后再通过这种父子之情来打动他的子侄。这是他教子非常成功的地方。我们可以举几个不同方面的例子来展示这一点。

比如，他在谈到入德之基时说，“凡富贵功名，皆由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功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而举止宜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在谈到对于子女的期望时，他说，“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这段话常常为人拈出，而如果我们熟悉他两个儿子的成就，就能够明白这段话在教子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有一次，曾国藩在信中向儿子承认错误，说，“余因去岁在家，争辩细事，与乡里鄙人无异，至今深抱悔憾，故虽在外，亦惻然寡欢”。

在教育儿子练字方法时，他说：“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功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只为间架欠功夫，有志莫遂。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素愿也。不能，则随尔自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耳！”

第四点是曾国藩教子的两条基本途径：一条是读书明理，另一条是事上磨炼。曾国藩《教子书》的主旨在教他的子侄如何做人，究其实，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是在教子侄如何读书。曾国藩是儒家的门徒，在他看来，做人就要读书。宋明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道问学和尊德性的争论，陆九渊说“尧舜不曾读得许多书，也堂堂正正做得个人”。曾国藩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要真正做一个人，就无法回避读书以明理。

他在一封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性难变”。他深切认识到，人的本性

是非常难以改变，但是他说，“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我们暂不去评判曾国藩对于面相学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读书可以变换骨相。读书不仅仅可以长知识，而且唯读书可以变化气质。但是前提是，“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不是一个简单的兴趣、爱好，或者一时的某种情绪。志是一种势必达之的情怀。立志和有恒相关，“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人可以变化气质，才会有圣有贤。

而读书当然首先意味着读五经。《教子书》中有大量的关于五经的讨论，或讨论经学之源流，或解释某句经文，或推荐读某一经所必需之参考书。一方面，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除了平定洪杨之乱，还有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派送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等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都是在曾国藩的倡议和组织之下才发生的。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无论是教育子女，或进行学术研究，还是为文化命脉之传承尽自己绵薄之力，他的基础都是五经，事实上，他一生核心方向都跟《五经》相关。所以，《教子书》中有大量的如何通向五经的讨论。

曾国藩特别佩服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他认为他们和段玉裁对中国古代小学的贡献非常大。小学明，则经义明；经义明，则大道明；大道明，则教化成；教化成，则国运昌。这是曾国藩的逻辑。所以，他引导自己的子侄读书，基本上是在读这种性质的著作，而且不辞辛劳地做提点。他特别注重小学，亦要求子侄通小学。另一方面，曾国藩是清末有意识地把考据义理辞章之学结合在一起、有意识地糅合汉宋之学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写文章一定要通古字，通晓字的古义。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好的文章。他说，“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申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之硬腔滑调之习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我们还要注意，他所说的读书不仅仅是读书，还有“文格文气、开合转折”和“故训大义”，而这些都事关人格。

曾国藩对子女的读书明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四个字——看、读、写、作。看，就是要泛观博览。读是指大量地背诵古文。要选择最好的文章，主要是《文选》、《史记》、《汉书》中的文章，大声朗读。此外，要读杜甫、陶渊明等的诗。中国古代语言、中国古代文字、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思想的最精妙处全部可以在这些文献中体现出来。写是写字。全世界只有中国（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韩国等）会把写字当作艺术。关键是，曾国藩在教育子女写字的时候反复提醒说，写字时要感受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人的品质的浸染和提升。最后，是作，作文。曾国藩在戎马之间要让

子侄一个月寄两三篇文章给他看，而且还要细细批改。对中国古代的文章、思想、书法的评论，是曾国藩《教子书》的一大特色。这也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教育子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因为这些东西既是曾国藩自己学问的体现，更是曾国藩希望子女通过这样一种学习深入到中国传统的良苦用心的体现。

谈到读书写字的时候，他说：“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字乏刚劲之气，是尔生质短处，以后宜从刚字、厚字用功。”谈到陶渊明的诗歌时候，他说，“反复读之，若能窥其胸襟之远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登堂入室。然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曾国藩总觉得曾继泽的气势比较弱，希望通过写文章改变这样的东西。所以，写文章和做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根本就没有区别。

最后，曾国藩谈读书时有一段有关涵泳的话为很多学者所推崇，他说，“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这与他的教育主旨培育性情有绝大关系。

第二种方式是事上磨炼。事上磨炼是王阳明的主张，他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它的源头可以远绍到孔夫子的主张。《论语》云：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请事斯语”也就是事上磨炼。曾国藩特别强调性情之培养不能只空谈道理，而要在实际事务上磨炼。当然，作文亦是一事。

《教子书》中第一封信写于曾国藩的母亲刚刚去世之时，这封信中有几点颇值得一提，譬如他表达对于母亲的感情；他给还在京城的曾纪泽写信，告诉他要不要开吊，“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开吊丧，讣不可太滥”。他们家当时不够宽裕，但他说，“盖我欠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所谓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国藩通过这样的事情教育他的子女怎么样做一个中正平和、有人情味的人，不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之间构怨，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和睦之风。

曾国藩常年在外带兵打仗，他有意识地培养二十岁左右的儿子开始主持家务。他告诫他们说，“凡世家有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尔二人立志支撑门户，亦宜自端内教始也”。只有先齐家，然后才可以举国平天下。还有，子女面对官府或出门在外时，“务知自重，在外以谦谨为主”。有一次，曾国藩派了一艘船送家属回乡，这艘船曾经是他用过的，船上有“帅”字旗，曾国藩就对他儿子说，谨记“船上有帅字旗，余未在船上，不可误挂。经过府县各城，可避者略为避开，不可惊动官长，烦人应酬也”。

当时湘乡县修县志找到曾纪泽，因为他有点文名，又是大家子弟，要他给县志写文章。曾纪泽征询父亲的意见。曾国藩说，你一定得去。第一，你去是给他们面子，做人要圆融，你不能够太生硬。第二，你去了就必须写文章。他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有所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这样就可以逼迫自己做事，锻炼自己的能力。

最后，达到教子之目的的基本保障是有恒。曾国藩说：“人生惟有恒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文一道，亦尝苦力思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自觉耳。”《易经》当中有一卦叫恒卦。“恒卦”是我们古代最早阐明恒心的。《论语》也特别强调恒的重要性。孔子引用过古人关于恒的理解“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还说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都指出德性之生成和恒相关。曾国藩讲恒是从两个角度讲的。第一个角度，是从作为父亲的他自己的角度，是教育的有恒性。刚才提到过，无论多么繁忙的时刻，他从来都不忘记教育子女的义务。另一方面，从子的角度来讲，是修养的有恒性。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德性教育跟有恒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因为伦理德性就在学不可已矣、学时习之，就在于时时刻刻一年一月不可停辍、不可中断的自修之过程。